

传播视野中的  
近代中国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持

# 媒介、 文化与 知识传播

黄旦 周奇◎ 主编

MEIJIE,  
WENHUA YU  
ZHISHI CHUANBO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传 播 视 野 中 的 近 代 中 国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持 ——

黄 旦 周 奇 主 编

# 媒介、文化与知识传播

MEIJIE, WENHUA YU  
ZHISHI CHUANBO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文化与知识传播/黄旦,周奇主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1

(传播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ISBN 978-7-5657-2898-3

I. ①媒… II. ①黄… ②周… III. ①报业—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16729 号

## 媒介、文化与知识传播

MEIJIE, WENHUA YU ZHISHI CHUANBO

---

主 编 黄 旦 周 奇

责任编辑 于水莲

特约编辑 张继媛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李志鹏

---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 真 65779405

网 址 <http://cucp.cuc.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印 刷 唐山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426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57-2898-3/G·2898

定 价 92.00 元

---

本社法律顾问: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 郭建平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黄旦，博士，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中外新闻传播思想、中国媒介史、媒介理论。

周奇，博士，《学术月刊》杂志社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中古史。

传播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 报刊与近现代中国城市 ···

··· 媒介史的研究与书写 ···

··· 传媒与社会变迁 ···

··· 媒介的表达和影响 ···

··· 媒介、文化与知识传播 ···

服务传媒 · 出版思想

# 重解报刊之“魅”

——报刊与历史研究

黄 旦

“档案是时间织成的布面上的一个小缺口，是对意外事件的偶然一瞥。但档案的体积又是如此之庞大，置身其中犹如扑入大海，无边无际无所适从”。这让阿莱特·法尔热觉得，阅读档案就好像驻足于一片黑压压没有空地的森林，只有在其中停留太久之后，双眼习惯了黑暗，方能够辨认出树木的轮廓。这真“像走在一条满是裂缝且分叉的小径上，需在寂静和摸索中构思问题。这就像一个在眼前旋转无数次的万花筒：暂停片刻，想象的图案就有了具体的外形，然后再次碎裂成五颜六色的光彩，新的形态也随之出现。这些图案非常短暂，稍微晃动就会产生其他形状。档案中所能找到的意义如同这些图案一样，有力但短暂，随着万花筒的旋转而逐个出现”。<sup>①</sup> 档案所散发之“魅”，令阿莱特·法尔热陶醉其间难舍难离。

那么，报刊可也有其自身之“魅”乎？法尔热倒是将档案与印刷材料做过一点比较。她指出：后者是一种专门针对公众的文本，是用来让公众阅读和理解的；无论曲笔或直书，印刷材料都有自己的意图，最简单、最明显的目的就是被其他人阅读。这与她所接触的司法档案性质完全不同。司法档案中虽然记录着许多人的生活的大致轨迹，但他们从没要求以这种方式被记录下来，<sup>②</sup>更不必说公之于众。用福柯的话来说，这是那些“无名者的生活”。<sup>③</sup> 法尔热因而以为，任何印刷材料，无论多么陌生，都不能与档案相媲美，尤其是那种身临其境之感。<sup>④</sup>

档案与印刷材料是否能相媲美（为什么非得相媲美呢？），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她所指出的“无名”与“有名”——印刷材料有意并有指向地让人阅读，从而缺少芸芸众生活色生香的气息和温度，多少说明印刷材料是有不同于档案之“魅”的，甚至与之气质是

① [法]阿莱特·法尔热：《档案之魅》，中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2、49、66页。

② [法]阿莱特·法尔热：《档案之魅》，第3-4页。

③ [法]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社会理论论坛》1999年总第6期。

④ [法]阿莱特·法尔热：《档案之魅》，第3页。

相背而行的。“印刷术不是把文件紧锁深藏,而是把它们从箱子里和密室里拿出来复制,让人们都能看到这些文档。”<sup>①</sup>戈公振将“为公众而刊行”,确定为报纸的“原质”之一,<sup>②</sup>不是没有道理的。

报刊与历史研究,大而化之,可分为两类,姑且命为“历史的报刊研究”和“报刊的历史研究”。二者虽然都以报刊为对象,但意图和重点均不同。前者是追寻报刊中的历史踪迹,以澄清、证明、补正、丰富某一历史过程或历史事件。简而言之,是以“报”证史——将报刊作为研究和书写历史的依据或材料,属于“所有研究史学撰著史籍所必须根据之种种资料”<sup>③</sup>之一。后者是要理清报刊自身的历史脉络,展示其演变的过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可谓以“报”为学——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sup>④</sup>。

我没有具体查考过以“报”证史起于何时。“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其实也只有在这之后,研究史学撰著史籍所根据的种种资料中,才可能有“报刊”的位置,因为从传教士开始的中国现代报刊是在道光之后才慢慢形成气候(虽然认可报刊有资格成为史料还有一个过程)的。陈垣所言极是,史料是“愈近愈繁”。<sup>⑤</sup>

“愈近愈繁”,可见史料是只进不出,纳新而不吐故。“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即是其“愈繁”的过程和呈现的面貌。由此也使另一个道理得以显明:若“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一个个遁迹消失,史料也就无从谈起。以此而言,史料是由“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所创、所产和所供,也没有什么不妥。它们是各安其位各开其路,这与当今有了数字技术而有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是同一个道理。要是我们认可“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均为不同类型的媒介,历史材料就是媒介的无中生有,那么德布雷的这句话是一点也不差的:文化和文明传承,总是通过媒介载体的使用,亦即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sup>⑥</sup>因此,“世间没有所谓自然存在之史料,凡一切资料俱必通过史家之觉识与命义始具史料意义与功能”<sup>⑦</sup>的说法,还只是出于史料和史家治史的关系,若以史料构成而言,恐怕还得加上一句:一切资料俱必由处于不同位置和关系中的媒介所开拓。

①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页。

③ 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页。

⑤ 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9页。

⑥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陈卫星审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⑦ 王尔敏:《史学方法》,第134页。

媒介(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等)各有所长,打开并通向不同的区间,<sup>①</sup>因此也就各“魅”其“魅”。档案之“魅”非报刊之“魅”:如果档案可以比拟为一个矩阵,并不表达“唯一”真相,它有时引导人们去发现,有时又让人迷失;<sup>②</sup>报刊就是李普曼所说的“探照灯”,虽然摇曳不定,但光照所向则确定不移,唯我独断。档案是无数人留下的痕迹,报刊是要让无数人围观它散发出的社会现实痕迹。就其实质,二者不应是真与假或者真实程度之辨,而是各有各的真实。好比“门”和“窗”,都可以透视外界,各自的形态框架决定了其视野所及和能发挥的作用,岂能摆放在真实与否的层面进行较量?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其特定的意图、体制制度、运作方式和性质功能,它们互为纠缠又互为区分,“各种特性的符号链与异常多样的编码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相连接,这就发动了种种不同的符号机制和事物状态”<sup>③</sup>,构成了历史的不同层面。“档案既提供了信息,也提供了使用信息的方式或者使信息具有逻辑性的方式”<sup>④</sup>,报刊亦是一样。各类史料可以互相参照,但不宜随便统合。以“报”证史的历史报刊之研究,大多忽视了这一点。他们习惯于把报刊内容抽取出来,与其他史料(比如档案)辨别排比,以构成一个特定的“真”,档案和报刊之“魅”也就因此荡然无存。

历史不能说源自文字,但的确是文字,使得历史有了明确记载。汉字的“史”,据称其本意是史官——以文字记事的人,后又申义为文字和历史记载。到了汉代,古代的字书一概名之为“史”。“文字的作用是记事,记录下来的材料”就是“史料”。章学诚于是有言,“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sup>⑤</sup>。这既成就了历史,同时也为理解历史和史料,造就了特定的思维定式、辨析逻辑和读解方式。熟既能生巧,也导致熟视无睹,一切好似理所当然,故很少有人意识到,“严格意义上的文字是一种技术,它塑造了现代人的智能活动,给智能活动提供动力”<sup>⑥</sup>。这为历史及其研究带来的,就是根深蒂固的文字心智。史家以线性的文字思维来认识、读解和评判一切,成了一种布迪厄意义上的“惯习”,或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所以海登·怀特就特地提醒,现代的历史学家应该意识到视觉影像的解读是完全不同于书写档案的。<sup>⑦</sup>

其实,史学家对待视觉图像还是相当谨慎的,它毕竟与文字记事差别太大,其自身之“魅”难以忽视也不能轻易抹除,否则彼得·伯克也不必专写一本《图像证史》。可是

① [德]马丁·塞尔:《实在的传媒和传媒的实在》,载[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媒体》,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237页,引见第215页。

② [法]阿莱特·法尔热:《档案之魅》,第68页。

③ [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④ [法]阿莱特·法尔热:《档案之魅》,第58页。

⑤ 许凌云:《读史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⑥ [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⑦ [美]海登·怀特:《书写史学与视听史学》,王佳怡译,《电影艺术》2014年第6期,第116-120页。

报刊不同,本就以“文字”为本,又是一种“记事”,看上去与“档案、碑传、文集、笔记”就是自家兄弟,属于“愈近愈繁”的家族自然添“丁”。这就不会使人去思想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反而是轻车熟路随手拿来。于是报中所载,与档案、文集、碑传所录的毫无二致,在历史的报刊研究中都属于同样性质的基本事实和历史材料。

自然,对于一些具体事实的查证,比如人物、地点、时间、事件、状况等等,这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正因仅仅关注其“记载”,报刊与历史的关系也就远远得不到展示。拿报纸来说,它是有“报”有“纸”:“报”以印刷为手段,以机构为标志,造就“公共书信”或“公共交谈”<sup>①</sup>式的传散沟通之范式;“纸”则有格式有面貌,长、短、疏、密,图、题、形、字之间,细细策划处处讲究,更不必说定期出版——报纸所不能或缺的时间因素。依麦克卢汉的说法,正是依仗着这样的时间,报纸才能够把社会塑造成一种整体的和延续的形象。<sup>②</sup> 当把这一切——“报”和“纸”都撇开,仅是剥离出那点内容,虽然干净,但怎能称得上是报刊研究,且又是什么意义上的报刊研究呢?比如“苏报案”,醉心于《苏报》内容以检点“革命运动”的点点滴滴,也就不会关心章士钊在报纸上所做的手脚,以及报纸与张园演讲、爱国学生等等的互为作用。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关于印刷术的研究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印刷术本有着诸多的影响,大多数欧洲近代史学者唯一熟悉的基本就是为传播新教思想出力。与关于其他运动的文字记述一样,在宗教改革记述中,印刷术的影响往往被腰斩,仅限于“传播”思想一个功能。一旦宗教改革完结,新教的传播完成,印刷商和出版商也就不再值得注意,历史的聚光灯就集中在后起似乎更加重要的发展动态上了。<sup>③</sup> 若不是新教宣传,印刷术也就没有出场的机会,既然如此,仅限于其“传播”思想的“腰斩”式理解,也就不令人奇怪。这种状况是否同样发生在中国历史学家关于报刊与历史的记述中呢?

以此看,王奇生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sup>④</sup>一文,对于历史的报刊研究就深有启发意义,因为其很好地揭示了现代刊物的特殊之处,即对于社会运动的策划、运作和介入。一旦引入这一变量,报刊内容的理解就不一样,新文化运动的过程和面向马上变得复杂,尽管其本意仍是出于澄清新文化运动的过程及其复杂面向。现代政治运动和大众媒介总是在一定的境遇中互为接近并相互作用<sup>⑤</sup>(不是相互补充),成为其迥异于传统政治(比如文书政治、清议政治)的重大特征。费夫贺看到的印刷书,

①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特里·N. 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②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6-267页。

③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第17页。

④ 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1-40页。

⑤ [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胡正荣校,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不单是技术上的巧妙发明,也是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sup>①</sup>“推手”的报刊与其“记载”不能分离,脱离了前者,那些“文字记载”梳理得再仔细,也不可能是“活”的。此种重于运动的因与果,而不是政治运动的经验和实际展开,<sup>②</sup>按照史家自身意图,也能勾勒并验证某些历史事实,但其代价是可能失去历史报刊的实际面貌和由此带来的历史事件的特殊性,见不出“戊戌变法”“苏报案”“新文化运动”等等各自的“灵韵”,似乎它们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运动”之重复,不同的只是宗旨、规模、目标、过程及其社会政治背景。

书本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sup>③</sup>这句话恰恰证明了媒介的力量。史料的“愈近愈繁”,并没有使人脱离字书的影响,反而统统摄入字书的光束,远近高低一般同。书写在没有媒介概念的情况下充当了通用的标准性媒介,<sup>④</sup>使得历史研究对于报刊的历史运用和演变的研究,难有新的进展和突破。细究起来,史籍本也是十分讲究区分的,是有“媒介学”的。依我看,目录学便是。书籍编目分类的要义,即是指示、标明书籍的部次流别,以便“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sup>⑤</sup>史料是寻找历史之指路碑,<sup>⑥</sup>目录学则就是寻找辨析史料之“指路碑”:注出不同书籍——“媒介”源流,就像今天的媒介理论辨别不同的媒介一样。其差异是前者始终在字书的范围之内,是字书的同异之辨,因为这就是当时媒介的状况及其要求。只是久久熏染于此,习焉不察,致使史家们没能举一反三,跳出此山中,从新的角度想象、理解和分辨“愈近愈繁”的媒介史料和报刊之“魅”,在熟悉的目录学基础上,添加不熟悉的“愈近愈繁”的媒介知识,形成新的一种“目录学”,从而为学史、读史、治史,开出一道新的类似目录学(比如史料媒介学)的入门之径。

另一类的研究,亦即一开始提到的“报刊的历史研究”,则是另一番景象。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一直在为如何显示报刊之“魅”——报刊史的定位及其独有价值而努力。不过其动因与媒介无关,而是来自如何与历史研究,更具体地讲是如何与政治史、革命史研究区别开来。“人们议论最多的是,编写出来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缺乏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它往往和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或者中共党史差不多”<sup>⑦</sup>。

报刊史混同于革命史和政治史,既是最直观的现象,也是遭受诟病最多的。那么,

① [法]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序,第3页;具体可参其第八章。

② [美]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③ [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第59页。

④ [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⑤ 许凌云:《读史入门》,第4页。

⑥ 周谷城语,转引自王尔敏:《史学方法》,第120页。

⑦ 宁树藩:《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载《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57页,引见第147页。

如何做呢？首先的建议是重新勾画体例，使之有报刊史自身的特点，不完全按照政治斗争来分期。<sup>①</sup> 进而言之，应以新闻事业发展为主线，改变让新闻事业史围绕一个个政治思想斗争和一个个政治任务展开，而是反过来，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是主体，政治思想斗争的发展过程是客体，后者是为了说明前者而存在的，现在是错把政治现象当成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sup>②</sup>

一个学科居然误认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好似婴儿被调包而错换了人生。这样的表述听上去不可思议，倒也清晰昭示出论者们的思路。无论是“报刊史自身的特点”，还是以“新闻事业发展为主线”、为“主体”，都在表明报刊史研究者们深信，报刊或者新闻事业可以从社会其他方面切割出来，圈出一个以“新闻现象”为界的“地块”，既可以保证其独有的研究对象，又能够确立研究之特色。这就马上牵扯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主体”（自身），怎么来认定？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主体不是一个自然实体。暂且不谈其词源学意义，仅就由笛卡尔所开启的主体哲学看，主体主要针对人而言。人凭着“我思”而成为认识的主体，意志的主宰，万物的尺度，自我“作为绝对本原，以理论理性的姿态踏上了自我认识之路”。<sup>③</sup> 由于人因群而在，人的自主自为就抽象为共同体的主体性——主张、信念和目标。共同信念是群体的一种内在属性，一个团体就是作为主体的群体，团体信念就是这些作为主体的群体的认知状态。<sup>④</sup> 所以马克思就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的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sup>⑤</sup>。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业或者报刊有其主体性也是成立的。如果真的能将此把握为“主线”，一一展开其变革和演化的历史面向，报刊史研究及其体例，肯定闪耀出自己的独特色彩，不复是“政治史、党史、思想史”的摹本。

然而，事情似非这么简单。比如哈贝马斯所见的欧洲报刊，就曾有过不同的阶段：以小型手抄行业为组织形式的私人通信系统，以思想传播为主的个人新闻写作阶段，以及 19 世纪 30 年代从“传播信念的报刊业向商业报刊业的转变”<sup>⑥</sup>。美国的报刊在

① 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和建议》，载方汉奇：《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37 页，引见第 23 页。

② 宁树藩：《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载《宁树藩文集》，第 148-149 页；以及宁树藩：《关于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科研工作加速学科建设问题》，载《宁树藩文集》，第 158-163 页，引见第 160 页。

③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11 页。

④ 石辰威：《潜在集体信念》，《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71-79 页，引见第 73-74 页。

⑤ [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4 页。

⑥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0-221 页。

18世纪前期，“不是政治工具，也不是新闻采集机构”，早期的报纸从来不主动采集新闻，只是刊登收集到的任何东西，作为一门生意来做。直到19世纪中期，办报都“不是一种独立性的工作，而是在政治世界里的一条前进道路”。<sup>①</sup> 梁启超所称的“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和“世界之报”，虽不乏渲染和夸张，但的确道出了报刊的复杂性。想想19世纪晚期上海的情形：传教士刊物、《申报》、《上海新报》、《时务报》等等，就见其一斑。这也就意味着，报刊（新闻事业）并无一个纯粹的唯一的“新闻现象”之“主体”（自身）。进一步说，报刊（新闻事业）是不是主体，是什么样的主体，来自研究者的体认，来自研究的角度、问题，来自历史现象与研究者的体验性契合，与之所设定的标准、预想某物或某方面的意义等等息息相关，并非一个客观的事实性存在。这就是利科所说的，是一个叙事认同的问题，是要讲述那个作为“谁”的活动。这个“谁”，不仅仅指研究者的理解和把握，也是依赖叙事方式来塑造的。研究者既是其理解者，也是其创造者和解说者。<sup>②</sup> 由于历史书写的问题、兴趣和确定的意义不同，所判定和型塑的主体就自然不同。比如报刊的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展开：作为技术的历史、经济的历史、社会或文化的历史、传递新闻的历史。詹姆斯·凯瑞甚至说，报刊自身就是人类意识的一种表达。无论我们将之视为一种制度，一套关于表达的法律特权，还是技术构成的主体，它首先都是一种精神气质和想象力的表达。<sup>③</sup> 借此我们就可以说，报刊是技术的主体、经济的主体、社会和文化的主体，也可以是新闻报道的主体乃至意识表达的主体。历史并不知道自己是主体，也不清楚自己有着什么意义，只有历史的书写者知道可能性。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质上就是理论性的。<sup>④</sup> 可是做报刊史研究的学者中，明白这一点的似乎很少，好像历史研究不是戴着特定的“眼镜”，循着预想的逻辑，做着“披沙拣金”的工作，而是凭空一扫，便是“满城尽带黄金甲”。

理论思考上的困境，迷恋而执着于“新闻情结”，将其绝对化为所有报刊的本然，也就难以在研究上打开局面，转而只能在具体事例中做辨析打比方：“我们的研究主体是新闻现象而不是政治现象。如果是在政治现象对新闻现象起着支配作用的情况下，其考察的着力点是政治现象对新闻现象的制约关系，也就是政治如何影响报纸观念、办报思想、宣传策略等等。如果新闻现象和政治现象是相统一的，便要从新闻现象的历史联系中提炼出新闻的研究课题，就像《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既是政治现象又是新闻现象，就不是去评判其政治主张，而是研究‘论战’和‘党报’出现的关系，探讨双

① [美]迈克尔·舒德森：《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郑一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01页。

② [德]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安延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184-185页。

③ James W. Carey,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Vol.1, No.1(1974).

④ [英]西蒙·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韩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方的宣传形式,以及‘论战’对于新闻文体改革的推动”。<sup>①</sup>这种“一案一策”式的经验谈,虽然充满着研究者苦心探索之印迹,毕竟是实用层面的个人体验和判断,不是一种标准也不可能形成通则,更无法放大到什么“主线”或“主体”。即就其针对的政治报刊而论,政治和报刊本就一体:报刊是政治的报刊,政治是报刊的政治,二者不存主从关系,也不能人为断开,否则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一定要做比较,其对象也是非政治报刊,而不是什么“政治现象”与“新闻现象”。

可见,历史报刊的研究是“愈近愈繁”,多多益善;报刊的历史研究则要“削繁就简”,试图返回到一个纯净的“新闻现象”或“新闻事业”之原点,从而勾画出其闭环式运动:产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展示报刊之“魅”。之所以命名为“新闻事业史”(或者“新闻史”),应该也是出于此种想法。报刊要报道新闻,或者要研究以报道新闻为己任的报刊,与将“新闻”(什么新闻?是机械复制时代的新闻还是前报刊的口语新闻?)作为整个报刊历史的质的规定性,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不必说戈公振式的“刊登新闻、揭载评论”之报纸,本身就是历史的,是报刊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并不代表所有,更不能覆盖或贯通所有报刊或者媒介。所谓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始终难以把广播、电视、通讯社等等统为一体,就足以说明其中的问题。于是只能围着所谓的“政治现象”和“新闻现象”打着转转,百般纠结又裹步难前:“在新闻史研究中,我们绕不开政治思想的影响”。“曾苦苦思索,却找不到出路。几经考究,深感以新闻特性分期,实难做到,还是依据政治斗争形势分期为妥”,因为新闻史本身与政治思想斗争史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而“新闻史本体结构复杂多元,联系松散”,带不动总体的变化。最后不得不妥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政治形势的空间找一个落脚点”,不过“所安下的还是新闻事业自己的家”,其证据就是汇全国之力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虽是以政治斗争形势分期,可这种分期只表现于各章的题名,至于表现具体内容的节、目,写的都是新闻活动,并未因分期而导致与政治史混同”。<sup>②</sup>分期是历史书写的基础,历史展开过程的逻辑,不同分期就是不同的历史,这是常识,现在竟可以与史实两张皮。暂且不论是否混同,也暂且不论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是否可以安下自己的“家”,其中所透露的一个信息是确定无疑的,这种探索基本不成功。

新闻史结构复杂多元不是错误,错误在于要清除这些多元和复杂,归并一起塞入一件紧身衣中,无功而返自是必然。报刊历史的研究者,因未能深刻把握报刊,亦就不能把握报刊史。报刊是三位一体:它是一种物质,是符号信息的载体,同时又是一种传播运作的方式。报刊史研究者仅仅关注“信息”,将报刊“内容”等同于报刊,“报”化约

<sup>①</sup> 宁树藩:《关于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科研工作加速学科建设问题》,载《宁树藩文集》,第160-161页。

<sup>②</sup> 郭丽华、宁树藩:《树立“本体意识”、探索新闻特性、加强新闻史学科建设——与著名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宁树藩先生一席谈》,《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为“纸”，此是一误。在这前提下，报刊史研究者又一厢情愿地认定内容即“新闻”（包括观念和技巧），并力图以此划界，自成一体，这既忽视了报刊的多样性与“报刊新闻”或“新闻报刊”的特殊性，又不能将“新闻现象”与“政治现象”切割清楚，于是只有再三强调报刊不是政治，但无法因此证明报刊是什么，此误二也。最后，而且更为致命的是，从内容着手，注定了把如何书写报刊史，当成了如何区分研究对象和还原对象，从未想到报刊应是报刊史书写的视角，是讲述“主体”——那个作为“谁”的活动时所抱有的特定站点。报刊史是研究报刊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情境下卷入社会，在影响、改变社会的同时也改变自己，而不是拘泥于那张纸上刊载了什么和如何刊载。总而言之，报刊史研究者感觉到的病症或许没有错，渴望突出报刊之“魅”的心情和努力也十分可敬，可是开出的药方完全错了，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搞清“报刊”是什么而且在什么地方。

伊格尔斯曾以“重新定向”四个字，来概括 20 世纪历史学的变化，原因是“自从 19 世纪初期国际上就开始作为一种专业规范在运用着的那种历史研究方式，已经是既不符合 20 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了”。<sup>①</sup> 当今中国的报刊与历史研究，无论是历史的报刊研究还是报刊的历史研究，恐怕也需要“重新定向”，因为 20 世纪后期至今的“媒介”现实，已经并将继续给以往作为一种专业规范在运用着的那种报刊与历史的研究方式，带来重大的冲击，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和看待一百多年前产生的新媒介——现代报刊，不得不重新领会历史书写的报刊之“魅”。

正是出于这样的缘由，遂有了“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此会的想法以及首先发起，来自周奇先生。他是历史学出身，又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过博士后，对两边的情况均有了解，属于能看到“堡垒”薄弱处的“内部人”。同时他所供职有年的《学术月刊》杂志社，在国内卓有影响，聚结着广泛的学术人脉，这也有利于选择和邀请与会者。首届的会议时间是 2012 年，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我的任务是邀请部分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参加。隔了一年，自 2014 年第二届开始，改为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学术月刊》杂志社联合举办并持续至今，一年一次没有停顿，一转眼已经是八届。其具体如下：

2014 年 9 月，第二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2014），地点：上海，承办者：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2015 年 7 月，第三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2015）：传播变革与近代中国，地点：沈阳，承办者：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sup>①</sup>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2016年11月,第四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2016):媒介、交往与近代化中国,地点:广州,承办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7年8月,第五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2017):近代中国的传媒、文本与社会变迁,地点:西安,承办者: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18年10月,第六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2018):媒介再思: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地点:武汉,承办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年8月,第七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2019):史料、史观与路径:媒介变革与近代中国,地点:南京,承办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年12月,第八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2020):媒介变迁与知识生产,地点:广州,承办者: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于这个会议的开法,当时与周奇是有基本共识的:第一,会议规模不宜大,大概在20多人。第二,与会者必须递交完整论文。第三,要有比较充分的讨论时间,不能是走马灯似的“我方唱罢你登台”。第四,要跨学科,首先是历史学者和报刊史学者的互为切磋,然后能慢慢扩展到其他学科。以“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为会名,也正是想为学科的多样化留有充足的空间。第五,每年会议讨论要有重点,而且有新意(从以上所列的每年主题变化中就可以见出这一点)。就总体观之,除了学科的多样化未能完全做到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落实了的。无论如何,以“传播”的名义能将不同学科的学者召集在一起,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创。会议主题的设计,则更是蕴含着举办者对于学术前沿的理解及其引领之意,故而显得不同一般。也正因如此,这个会在新闻传播学界赢得了不错的名声,其所具有的学术品格和展现出来的严谨会风,是有一定口碑的。

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从第二届到第七届会议论文中有所选择的成果,<sup>①</sup>大致上可以反映出会议的面貌和质量。显然,论文集中的文章并非篇篇都属上乘,而且有所参差也是难免,不过作者们的创新努力是明显可见的。无论是其关注的论题,切入的视角,乃至研究 and 书写的路数,均不乏使人有面目一新之感。需要说明的是,论文集的编纂主要来自周奇之功,他以一个学术刊物编辑的眼光,以及本职工作所养成的细心和耐心,以文章质量为重,同时也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尽量呈现地域和作者的多元),精挑细选,形成了现有这样的五卷;其间还要分别与作者联系,要考虑每一卷的主题以及文章主题的集中,完成了巨大的工作量。在此,对周奇的辛勤劳动和对报刊与历史研究的不懈推动,表示深深的谢意。自然,同样也非常感谢各位论文的作者为此所做出的贡献。

<sup>①</sup> 第一届会议的论文在开完之后即结集为《传播视野与中国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第八届会议的时间是2020年,其论文还来不及收入。

会议时间久了,就容易落入既有的套路。因此,八届会议之后,如何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推进,这既包括组织思路、主旨,也包括会议质量的提高和会议方式的变化,已是我们面临而且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之前曾经和周奇有所讨论,初步也有了一些想法,不过还未有一个定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套论文集的出版,是总结以往,更是为开拓未来。我们愿意以此为契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非常期待各位旧友新朋的批评、建议和支持,只有同心合力,锲而不舍,方有报刊与历史研究的新天地、新景象。

# 目 录

## 变革背景下的媒介实践与知识转型

- 在“书”与“刊”之间：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  
——对早期几份传教士中文刊物的考察 黄 旦 / 3
- 《中外新报》中的伦理与科学启蒙 李安定 / 27
- 丛书时代语境下的研究系与共学社 陈 捷 / 37
- 晚清书院读报活动与时务新知的传播 蒋建国 / 53
- 大众传播与清季财经知识形态转型  
——以日本税制与清季税制革新为中心 刘增合 / 70
- 海东之国与未见之书：试论抄本《论语征》及其相关问题 曹南屏 / 87

## 话语流变与知识生成

- 从“大书院”到“大学”：近代中国对 university 的翻译 范广欣 / 107
- 现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形成  
——以 1890—1924 年为中心 刘宪阁 / 123
- “文以载政”：清末民初的“新名词”论述 张仲民 / 143